

**UCRN 2016 年年会：新常态下的中国城市化
博士生论文竞赛投稿**

作者：张恩迅

机构：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参加项目：暂无

邮寄地址：广东省广州市中山大学南校区 353 栋

电子邮箱：39181334@qq.com

推荐人姓名：周大鸣 教授

推荐人邮箱：hsszdm@mail.sysu.edu.cn

推荐信

尊敬的 UCRN 大会组委会：

本人推荐中山大学 2015 级博士研究生张恩迅同学参加
UCRN 2016 年的博士生论文竞赛，理由如下：

- 1.本文探讨了与珠三角“城中村”地方经济不同的区域经济特征，符合本次大会“新常态下的中国城市化”的参会主题；
- 2.本论文结构清晰、语言简练，符合参会的学术规范；
- 3.本文提出的“村中城”地方经济网络特征是对珠三角城市化发展特点的补充，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如论文入选，本人或所在机构将承诺负责学生的往返交通费。

推荐人：

推荐时间：2016 年 1 月 6 日

“村中城”的地方经济网络 ——以南海民乐地区为例

摘要: 上世纪 90 年代, 珠三角城市化特征由过去的自下而上、自发性发展模式转变为自上而下、以中心带动周边的发展模式。民乐作为曾经南海西樵纺织业的工业、贸易核心区, 其区域功能和角色亦发生了从中心到边缘的转变。同时, 伴随当地纺织业转型, 大量本地人的生计方式和市场交易网络发生变迁, 形成了与“城中村”经济结构截然不同的地方经济网络, 如本地化的就业网络、本地化的市场交易网络以及就业多元化和普遍化等。而民乐地方经济网络的形成, 对村中城空间格局的延续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村中城 生计变迁 地方经济网络

Discussion on The Regional Economic Network of “Rural Town”: A Case Study of Minle

Abstract: Based on the case study on Minle of Xiqiao Town of Foshan, Guangdong Province. In the 1990s,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ization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changed from spontaneous development model from the bottom up to top-down development model, which emphasizes central areas propel surrounding areas. As a past core area of Xiqiao's textile industry, Minle has also marginalized. In the meanwhile,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local textile industry, a large number of local people's livelihoods changed as well as their market trading network, which formed a very distinct regional economic network separating from the economic structure of rural town. The formation of Minle's regional economic network,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continuing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ural town.

Key words: Rural Town, Changes of Livelihoods, Regional Economic Network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后，珠三角经济开放区的设立使其率先成为中国最早开始迅速城市化的地区，中国第一波工业化浪潮来临。“三来一补”、“两头在外”等中小型加工制造企业大量涌入，使得工业区迅速取代了珠三角传统的桑基鱼塘地区。同时工业区产生大量的就业机会亦吸收了一大批来自中西部的自发性迁移人口^①。而珠三角的乡村地区则承担了绝大多数外来人口的生活、生产、服务空间，但由于受建设经验、资金短缺等因素的制约，“粗放增量景观”迅速扩张，客观上形成了早期珠三角高密集城中村的雏形。^②上世纪 90 年代后，珠三角地区大、中城市扩张速度突飞猛进，与附带城中村雏形的小城镇相互交接并将其包围，形成的相当密集的“握手楼”、“一线天”、“烟囱楼”、“贴面楼”等异化的城中村景观，引起了地理学、城市规划、人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关注，许多学者从经济层面对珠三角乡村都市化的动力及特征、城中村的经济结构及形成、城中村问题治理及改造等进行了大量研究。

关于珠三角乡村都市化的动力及特征，多数学者强调外部经济因素的重要性。折晓叶认为外来企业使“超级村庄”命运牵系于国际市场，打破封闭性经济而向外扩展，特别是跨越行政镇、区而向国内大市场扩展的趋势^③。薛凤旋等人提出珠三角城市化的动力源于全球化背景下的外资驱动^④，其经济动力并非来自内部城市的经济发展，而属“外向型的城市化”^⑤，宋栋提出珠江三角洲城镇化的主要拉动力是香港^⑥。总的来说，珠江三毗邻港澳的地理位置是其城镇化的基础前提；乡村劳动力非农化和乡镇工业的发展是其城镇化发生的重要内在动力；

^① 薛凤旋，杨春：《外资：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新动力——珠江三角洲个案研究》，《地理学报》1997年第3期。

^② 许学强，周春山：《论珠江三角洲大都会区的形成》，《城市问题》1994年第3期。

^③ 折晓叶：《村庄的再造：一个“超级村庄”的社会变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16-118页。

^④ 薛凤旋，杨春：《外资：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新动力——珠江三角洲个案研究》，《地理学报》1997年第3期。

^⑤ 李胜兰：《外向型城市化发展模式研究——珠江三角洲个案研究》，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⑥ 宋栋：《中国区域经济转型发展的实证研究：以珠江三角洲为例》，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11页。

对外开放政策是其城镇化的外部推动力量^①。但周大鸣认为，珠三角的城市化发展特征已然发生转变：珠三角大城市的中心带动作用越发明显；单一的劳动密集型向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资金密集型并举发展；资金流入呈多元化；农村城市化地区与大城市间的经济关系越发密切；出口市场更多元化；低档次小规模的制造业逐步升级；高素质优秀人才不断增加；城市化动力从外部因素转向依靠机制和体制的内涵因素^②。

关于城中村经济特征及形成缘由，城市规划、地理学更关注于土地利用规划管理以及建设景观等物质性问题，社会学、人类学者则将焦点集中在社区、人口的文化观念、生存状态等问题，如本地人与移民的二元社区与融合^③。阎小培等人认为城中村是被城建用地所包围或纳入其范围的原有农村聚落^④，房产出租、经营性劳动和分红成为村民的主要经济来源，由于村集体有大量的土地、房产、厂房等租金收入，因此一般都会实行股份制经济社，而大量的出租加分红收入又衍生了一批游手好闲的“二世祖”和“食利阶层”^⑤。由于缺乏农业用地，经济以第二、三产业为主，城市建设征地的补偿也成为城中村集体经济收益的一个重要来源^⑥。双重特性明显，以出租经济及集体物业为支撑的原住村落和以外来人口为主体的低收入聚居社区^⑦，呈现出正式经济的高端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和非正式经济的低端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并存的景象^⑧。对于城中村的形成机制，张建明认为，在农村集体土地征用过程中，将征用土地中的一定比例划为村镇经济发展用地和自留地的普遍做法，促使城中村形成^⑨。顾朝林等认为城市功能结构从传统制造业经济向服务业和高技术经济转变是城中村形成的动力源泉，服务业和经济国际化是两个基本要素^⑩。而李培林等人则指出，村民在房屋

^① 阎小培，刘薇：《珠江三角洲乡村城市化的形成机制与调控措施》，《热带地理》1998年第1期。

^② 周大鸣：《泛都市区与珠江三角洲城市化未来发展方向》，《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③ 周大鸣：《外来工与“二元社区”》，《中山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④ 阎小培，魏立华，周锐波：《快速城市化地区城乡关系协调研究——以广州市城中村改造为例》，《城市规划》2004年第3期。

^⑤ 刘伟文：《城中村的城市化特征及其问题分析——以广州市为例》，《南方人口》2003年第3期。

^⑥ 郭艳华：《论改造城中村的现实途径》，《城市发展研究》2002年第4期。

^⑦ 魏立华，阎小培：《中国经济发达地区城市非正式移民聚居区——城中村的形成与演进——以珠江三角洲诸城市为例》，《管理世界》2005年第8期。

^⑧ 蔡禾编：《城市社会学：理论与视野》，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年。

^⑨ 张建明：《广州都市村庄形成演变机制分析——以天河区、海珠区为例》，博士论文，广州：中山大学，1998年；方庆方，马向明等：《城中村：我国城市化进程中遇到的政策问题》，《城市发展研究》1994年第4期。

^⑩ 顾朝林，C.克斯特洛德：《北京社会极化与空间分异研究》，《地理学报》1997年第5期。

租金和土地快速增值的情况下，追求土地和房屋收益最大化及村落共同体的利益内聚是城中村形成的关键^①。

关于城中村问题治理及改造，田莉认为城中村建设发展的自发性和盲目性是由于缺乏行之有效的城市整体规划设计^②。阎小培等认为寄生型的村民生存状态和心理动态，数倍于村民且没有根植性的寄居性外来人口，而外来人口的高密度聚居是形成出租屋市场并引发其他社会问题的根源所在^③。蓝宇蕴认为物业出租经济带来尽可能外移的市场风险，简化的经营管理带来无法回避的高失业率^④。受制于政府财政约束，居委会（村）干部往往兼任公司董事长，“三驾马车，一套人马”（股份合作经济组织、农村社区党委与居委会）的传统村社管理模式为村庄精英的牟利行为创造了机会^⑤。李培林指出村民作为强大的村集体经济的股东，在经济地位上和一般市民及外来房屋租客有极大差别，因此他们更愿意做村民而非市民^⑥。而魏立华、阎小培则提出城中村是一个非常活跃的“社会经济实体”，作为低收入外来人口聚居区的城中村在功能上是合理和长期的，是目前最合适的城市低收入人口居住模式，建议在存续前提下进行转型，提出原位改造低收入廉租房社区的改造思路^⑦，构建“政府—村民—开发商”的利益均衡机制，有步骤、分阶段的进行城中村改造^⑧。

综上所述，从珠三角乡村都市化的发展背景及城中村地方经济的研究来看，城中村的经济特征表现为：不稳定性，高失业率和人口高流动性是导致经济不稳定的主要原因；依赖性，对外来投资流入、世界经济体系影响以及物业出租、寄生型村民对土地经济的依赖；扩散性，外来人口缺乏与城市融合的强烈愿望，流入城市是手段，最终目的是挣钱返乡，本地人靠着颇丰的租金收入亦倾向在村外消费；二元性，基于血缘、宗族关系的利益共同体形成的股份分红与外来人口形成明显的二元社区；受中心城市辐射影响大，从过去的自发型的自下而上发展变

^① 李培林：《巨变：村落的终结》，《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蓝宇蕴：《都市里的村庄》，博士论文，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3年。

^② 田莉：《城中村的真问题》，《开放导报》2005年第3期。

^③ 阎小培，魏立华，周锐波：《快速城市化地区城乡关系协调研究——以广州市城中村改造为例》，《城市规划》2004年第3期。

^④ 蓝宇蕴：《都市里的村庄：一个“新村社共同体”的实地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156页。

^⑤ 蓝宇蕴：《城市化中一座“土”的“桥”——关于城中村的一种阐释》，《开放时代》2006年第3期。

^⑥ 李培林：《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

^⑦ 魏立华，阎小培：《中国经济发达地区城市非正式移民聚居区——城中村的形成与演进——以珠江三角洲诸城市为例》，《管理世界》2005年第8期。

^⑧ 阎小培，魏立华，周锐波：《快速城市化地区城乡关系协调研究——以广州市城中村改造为例》，《城市规划》2004年第3期。

为政府主导型的自上而下的发展。

基于上述观点，其研究对象主要以广州、深圳、佛山等经济发达地区的城中村研究较多，它们地处中心城市的辐射范围内，受市场、产业和政策的影响极大，较改革开放初期遍地开花的小城镇来说，这类地区是特殊的。以珠三角为例，改革开放初期就地城镇化的地区除了演变为被城包围的村和城市边缘的城中村外，还有一大批地处珠三角都市圈各大城市连接地带的被“村”包围的“城”，也即很多村落内或邻近村落间围绕特定市场和产业自发形成的“城”，由此构成“村”包围“城”的空间格局^①。这些区域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发展与城中村一同起步，经济、社会、文化结构颇为相似，但随着城市化特征的转变，受城市发展模式、地理区位、政府政策、产业升级等因素影响，其呈现出的地方经济特征与城中村越来越不同，而目前学界对于此类区域的地方经济网络关注较少。本文试图通过个案分析，阐释“村中城”地方经济网络的发展背景及特征，并思考此类区域的地方经济网络对于村中城空间格局的延续所具有的作用和意义。

二、地方经济网络形成的背景

本文研究个案为广东佛山南海西樵镇的民乐地区。民乐位于佛山南海西樵的西北部，由民乐社区和樵乐社区组成（如图 1）。民乐社区是民乐村委会 2011 年“村改居”而来，面积约 5.8 平方公里，辖 14 个自然村和 18 个村民小组，现农业常住人口 2100 多户、7100 多人，流动人口约 4200 人。樵乐社区前身是民乐城区，其面积约 2 平方公里，有 3 个居民小区，居民住宅楼 24 栋，住户 2575 户，常住人口约 6700 人，流动人口约 1100 人。^②解放前，民乐凭借发达的水运系统成为华南丝区的集散中心，改革开放后凭借纺织业发展走上乡村都市化的道路。

^① 杨小柳：《村中城：一种半城市化类型的研究》（暂未发表）

^② 资料来源：民乐居委会、樵乐居委会公示栏。



图 1：民乐地理区位图

20世纪70年代，通过拆分丝织社的方式，民乐建起南海丝织二、三厂，上世纪70年代至1983年是两厂最兴盛时期，吸收了大量本地劳动力。

1986年，私人纺织企业开始大量涌现，受其高额利润吸引，国营厂人才不断流失，1986至1995年，是西樵私人纺织业最兴盛而国营企业全面衰退的时期，大量外来务工人员涌入，截至上世纪90年代末，民乐外来人口最多达到12000多人，主要来自广东省内、广西、湖南、贵州、四川等地。

20世纪90年代，随着民乐纺织业转型以及南海城市化特征的转变，一大批当地人退出纺织业而选择另谋生路，民乐地区形成了与城中村经济截然不同的地方经济网络。

从1992年开始，当地掀起设备升级、更新的浪潮，陈旧机器被国外进口机器淘汰，当地数以千计的家庭纺织作坊由于产品低端、设备陈旧、资金不足等被淘汰^①。加上江苏、浙江、福建等地纺织工业区相继建立，国内纺织业竞争加剧，民乐纺织业结构单一、技术含量低、纺织产业链不完整的问题开始凸显。如民乐纺织业主要以织造中间环节的纺织面料为主，面料包括家居产品用料、服装用料以及工业用料，而上游的纺织机械制造业、面料原料和染色助剂生产业，还有下游的服装、家居制造业的缺失，也直接导致了其工业竞争力的下降。虽然目前工业仍是当地经济的支柱，如2014年民乐地区生产总值是22.6亿元，第二产业占

^① 杨小柳，胡敏哲：《华南丝区的变迁——广东南海民乐地区的个案研究》，《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生产总值 80%以上^①，但自 2004 年以来，民乐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发展均呈整体下滑的趋势，如第一产业的产业占有率为 2004 年的 4.27% 下降到 2014 年的 3.54%；第二产业的产业占有率为 2004 年的 83.9% 下降到 2014 年的 81.93%^②。

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后，珠三角地区“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自下而上、自发式发展的乡村都市化模式，在近年来变成了国家政策主导下的自上而下的、规划式发展的“新城市中心”的都市化，例如广州，上世纪 90 年代老区是荔湾、越秀等，1997 年东进开拓天河、番禺、清远、从化等，可清楚看到政府运用国土、产业、政策有意识构建新的城市中心，因此城市化是可以被规划的。南海的城市化发展模式也发生了同样的转变，民乐作为曾经西樵纺织工业化发展的核心区域，随着西樵轻纺城、工业园的相继建立，其贸易、工业受到较大冲击，西樵的人力物力财力都向镇政府所在地官山倾斜，官山也成为西樵纺织发展和城镇建设的新中心，民乐的区域角色和功能随之发生转变^③。

三、生计及地方经济网络的变迁

本文将民乐隔涌村作为主要调查点，其他村辅以调查。隔涌村的经济模式和地理位置在民乐颇具典型性。民乐社区下辖 14 个自然村的经济模式大致分三类：一是依托市场型的延陵村，二是依托开发区型的北塱、福地、伊洛等村，三是传统型村庄，如依靠鱼塘、厂房收租的隔涌、祖仁、豫章等村（如表 1）。一方面，传统型村庄的数量占 70%以上，更能反映民乐经济的普遍现状，而隔涌属传统型村庄之一。另一方面，隔涌较其他村更靠近经济繁华的城区，其距原南海丝织二厂、民乐集市均不足百米，国营丝厂、民乐集市作为地方经济不同时期的发展载体，是最能直接反映城市化转变及产业转型的地方，其所在的城区也一直是民乐经济最活跃的区域。因此，毗邻城区本地村民的生计方式亦是紧随地方经济网络的转变而不断变迁的。

表 1 民乐辖管自然村的主要经济模式

经济模式	村 庄	主要经济来源	说 明
------	-----	--------	-----

^① 数据来源：民乐居委会。

^② 数据来源：中山大学 2006 年佛山田野实习报告和民乐居委会。

^③ 杨小柳：《村中城：一种半城市化类型的研究》（暂未发表）。

依托市场型	延陵村	延陵村市场出租	2014 年总收入 760 万, 市场出租收益 400 万, 占总收入一半以上
依托开发区型	北塱、福地、伊洛等	开发区土地出租	三村出地最多。如第三的伊洛村出地 100 亩, 2014 年总收入 100 余万, 开发区收益 40 余万, 占总收入近五成
传统型	隔涌、祖仁、南塱、敦伦、南塱新村、多墩、新地、大地塱、豫章、海边等	鱼塘、厂房、店铺出租	2014 年鱼塘、厂房、店铺收益收入均占总收入一半以上

数据来源：民乐村委会

在隔涌村民最集中的生活区，几乎所有家庭中均有成员从事过纺织业的经历，如开纺织厂、一线工人、工厂中层、开家庭作坊、回收纺织废料、运输工业材料等，过去以纺织业作为主要生计的村民以 40 岁以上村民和女性村民居多。目前村民职业主要为：第一产业以养鱼者居多，种植蔬菜多为家用；第二产业以工厂中层管理者居多，如行政管理、生产线监管、仓库货物管理、会计出纳、原料运输等。少数人在经营家庭作坊、承包建筑、五金加工、回收工业废料、销售纺织原料等；第三产业中以个体经营户、打工者居多，如会计、货运司机、理发师、酒店清洁员、保安、摩的司机、餐饮服务员、超市导购、收银员、保险销售等；其他情况则是靠土地股权分红、企业退休金生活的老年人，无业人员较少。

1. 生计转型趋向本地化

上世纪 90 年代后，随着当地纺织业转型升级，村民们的生计转型趋向本地化，形成了本地化的就业网络。村集体对鱼塘、土地资源的牢牢把控，客观上为本地化就业网络创造了条件，加上本地人对于就业的理性考量，在主观上也更倾向本地就业。

首先，鱼塘只对本地人出租，外地人没有承包权，养鱼是当地农业从业者的主要经济来源，从业者多以中老年男性为主。民乐耕地极少，总面积不足 2000 亩^①，农业用地几乎都是鱼塘。2014 年，民乐农业产值 7998 万元，只占到经济总产值的 3%^②，因此，民乐的非农化经济趋势十分明显，从事农业的人数也较少。以民乐隔涌村为例，2014 年隔涌村鱼塘 28 个，总面积 169.92 亩，年承包款近 14 万元^③，年承包均价为 823 元/亩，承包价由水质、区位等因素决定，一般鱼塘

^① 数据来源：2014 年《南海县志》。

^② 数据来源：民乐居委会公示栏。

^③ 数据来源：隔涌村村委会。

年承包价基本在 1100~1200 元/亩。当地承包鱼塘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家族式承包模式，如同姓兄弟一起合伙承包，隔涌村大部分鱼塘基本被潘家、梁家、刘家和罗家四家所包，四家承包面积占总面积一半以上；二是大户式承包模式，即一个人承包的鱼塘面积要远超人均承包面积，如隔涌村梁某承包 22 亩鱼塘，而村人均承包面积为 3 亩，其承包面积为人均承包面积 7 倍。

由于养殖传统的四大家鱼利润很低，当地已很少有人再饲养四大家鱼，取而代之的是利润更高的生鱼、鸭嘴鱼、黄骨鱼和长吻鱼等鱼种。以当地养鱼户吴师傅为例，上世纪 90 年代经营纺织厂，倒闭后开始养鱼。他承包鱼塘 20 亩，去年养殖投入（不包括人工费）在 80 万元以上，平均每亩鱼塘年投入至少 4 万元：其中每天饲料费约 50~60 元/亩，每亩鱼塘饲料一年投入至少 18000 元；每周鱼塘消毒和药物费约 300~500 元/亩，每亩鱼塘药物费年投入至少 16000 元；还有幼苗成本、鱼塘承包款、设备费、电费等。如遇到鱼苗疫情、水污染、停电等意外情况，其每亩的经济损失均以万元计算。在收入方面，吴师傅 20 亩鱼塘按照每斤市场收购价减去每斤鱼的投入成本计算利润，他至少要保证 6000 元/亩以上的年利润才可能维持基本的人工开销和实现基本的盈利（如表 2）。因此，养鱼在当地算是风险和投入都比较高的行业，需要有一定资金实力和养殖技术的村民才能胜任，养殖户人数也较少。

表 2 2014 年养鱼户的每亩收入情况表

鱼 种	每亩年产值（斤）	每斤纯利润（元/斤）	每亩年利润（元）
生鱼	13000	0.5	6500
黄骨鱼	8000	1	8000
鸭嘴鱼	5000	2	10000
长吻鱼	10000	0.7	7000
其他鱼种	5000	0.5	2500

数据来源：访谈所得

其次，民乐的村集体土地资源如厂房、店铺更倾向租给本地人经营，形成了一个以本地居民为主要对象的本地化租赁市场。土地是民乐各村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在土地流转过程中，村集体牢牢控制着对土地的支配权，保证了土地收

益权。在全国其他农村的土地流转市场中，在城市资本介入下，往往会出现村集体不仅丧失了土地支配权，而且也转让了土地使用权的情况。而当地村集体则通过两个策略，最大限度地控制了土地的支配权：一是土地投包人大都局限于本村人或邻村种养大户，对外来资本介入，村民和村集体本能地排斥。二是制定短期的土地投包期限，当地的投包期限只有3至5年。其缘由就在于，村民及村集体对农用地转为非农用地存在强烈的预期，只有将土地支配权牢牢控制，土地“农转非”的情况才不会出现，其土地收益才有保障。^①以民乐延陵村为例，在延陵村入口处有一间面积约3亩的厂房，厂房土地产权目前属于南海公有资产办公室。据村长介绍，上世纪80年代厂房所在地还是一片荒地，属延陵村集体土地，南海供销社以建食品加工站为由向延陵村借地建厂房，建起厂房后又瞒着村里人办了国土证，私自改变了土地性质，此事后民乐所有村集体都本能地排斥将土地、店铺租给外人使用。

最后，当地人就业选择也倾向本地化，一方面当地人如果去了佛山、广州、深圳等地打工的月平均工资在五千元左右，除去房租和日常消费，工资所剩无几，还不如在当地就业；另一方面受自身条件限制，上世纪90年代从纺织业退出的本地人年龄多在40岁以上，几乎未受过正规的教育和技能培训，加上年龄、体能上的劣势，即便外出务工也极可能被淘汰。并且，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民乐地区外来务工人员不断增多，在当地扎根生活十年以上的外地人比比皆是，这无形中也加深了当地人对民乐的认同感，即使面临经济衰退的风险，当地人仍坚信民乐仍是一片充满就业机会的“乐土”。

2. 市场交易网络趋向本地化

与生计转型的本地化趋势相对应，民乐的市场交易网络也趋向本地化，市场交易网络逐渐转变为以满足当地人需求为主的社区。例如过去以布匹外销交易为主的民乐工业品市场的衰落和现在以满足居民日常需求的农贸、杂货、生鲜交易为主的民乐综合市场的繁荣。

民乐集市由四个主要的市场组成，分别为民乐旧圩、工业品市场、穗丰市场和民乐市场。四个市场均位于城区民乐内涌与官山涌的交汇处，呈“之”字形分布，各市场的间距均不足百米。民乐旧圩是民乐历史最久的集市，基本已荒废，

^① 刘宪法：《“南海模式”的形成、演变与结局》，张曙光编：《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土地卷）》，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年，第74页。

只有少数本地人在经营杂货铺；工业品市场建于上世纪 90 年代，主要用来给本地人经营布匹生意，目前已被闲置；穗丰市场主要以经营服装鞋帽生意为主，外地经营者居多，占 80% 以上；民乐市场由延陵村市场，西樵市场和综合市场三部分组成，主要以经营农贸、杂货、餐饮、服装等为主，本地经营者居多。

民乐工业品市场是上世纪 90 年代是西樵的布匹交易中心和纺织业的象征，据说最繁盛时期“订单应接不暇，钞票要用麻袋装。”但由于西樵轻纺城 1997 年在官山建成后，工业品市场大部分店铺迁往官山，市场人气开始急速衰败，目前已处于“人去楼空”的状态，也凸显出了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区域规划对地方经济造成的影响。工业品市场门面约 200 个，目前正在营业的仅剩 8 家（1 家布行、1 家裁缝店，其余为服装店），门面空置率超 90%，尤其是与民乐纺织业的兴衰息息相关的布行生意，更是从当年“遍地开花”到现在的“仅存一家”。

案例：民乐最后一家布行

2015 年 7 月 16 日

走进偌大的工业品市场，家家户户的门面紧锁，空无一人。拐进一个狭窄幽暗的小巷子，突然一个面积约百来平方的布行映入眼帘，各色的绸子布料堆满大堂，里面不时传来妇女的讨价还价声，竖耳细听，有普通话、粤语、四川话……这就是民乐地区最后一家布行：祥隆布行。

布行正门紧锁，只开了一张侧门对着巷口。经营布行的是 40 多岁的陈姐，1989 年从南海丝织二厂辞工后，1991 年搬进工业品市场开布行，一晃就是 27 年。店中布料有 100 余种，以服装布料、窗帘布料、工业布料为主，搭着出售一些服装配件和裁剪熨烫工具。

陈姐说：“1989 年整个民乐的门店都是卖布的，那时黑龙江、新疆的人都跑来买布，那时装钱要用大麻布袋……现在这个市场基本没人做了，一是市场里很多人都搬去了西樵轻纺城，二是这些年布不好卖，很多人都搞其他生意去了。”

在聊天中，偶尔会有一些中年妇女来购买服装配件。陈姐说每天营业额基本维持在两、三百元，就靠着布行收入维持着整个家庭的生活。她很茫然，搞不懂布行还能经营多久，笑笑说：“过一天算一天。”笔者离开时，陈姐骄傲地说：“儿子也在广州念大学，学的是动植物检疫专业，将来毕业好找工作，不用像我们这代人一样跟纺织打交道了。”

与工业品市场的冷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马路对面的民乐综合市场的繁荣。民乐综合市场始建于上世纪 90 年代，营业面积 8600 平方米，摊位数量 88 个，本地经营者约 55 户，一半以上由国营丝织厂下岗的纺工组成。市场从早晨开始便人来人往，集市除了满足民乐本地人、外来人、工厂工人等日常需求外，周边许多村落如百东、联新等邻近民乐的村民也会来这里购买商品，终日热闹非凡。据统计，综合市场是目前民乐成交额最多、人流量最大、本地经营者最多的集市，2014 年成交额达 2423 万元^①。

3. 就业多元化和普遍化

就业多元化和普遍化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大量从纺织业退出的本地居民职业选择更加多元化，二是在民乐集市中，多年来也形成了外地人和本地人的两套市场经营体系，均以满足民乐地区居民的消费需求为主。

民乐的农业生产主要是水产养殖，如前文所述，由于养鱼风险较大，从业者一般是当地养殖技术、资金实力较好的中老年男性为主，从业人数较少。民乐的农业产值占总产值比例在逐年降低，耕地面积不足 2000 亩，农业用地几乎都是鱼塘，且不断有村庄通过“填塘造房”的方式来发展非农经济，地方经济的非农化趋向十分明显。

工业上本地人主要从事较轻松的行政管理、财务管理、生产仓库监管等工作，没有本地人再愿意从事一线工作。一方面是过去的本地纺织工人年龄偏大，身体素质和反应速度均不如年轻的外来打工者；另一方面是外来人口的劳动力成本更低，相比本地人更勤奋和便于管理。同时，随着工业设备的日益精良化，不仅在生产线上难觅本地人的身影，外来工人的数量也在减少，据某厂管理者介绍：“以前十个人操作一台机器，现在一个人管理十台机器。”民乐企业以家族式经营为主，本地从业者多通过亲戚、熟人关系就业的中老年人，劳动强度低、收入较高，从业人数较少，如表 3 所示：

表 3 民乐某厂中层管理者就业基本情况

访谈者	性别	年龄	职业	月工资	工作形式	工作时间	工作职责	就业途径

^① 数据来源：樵乐社区居委会。

陈某	女	48岁	会计	5000元	全职	不固定	负责工厂做账、交税等	老板表妹
陈某	男	55岁	仓库管理	4000元	全职	9:00-18:00	负责仓库货物安全和清点工作	老板哥哥
潘某	女	32岁	行政管理	3000元	全职	9:00-17:00	负责工人信息管理、宣传资料、工作接待	老板娘侄女
赵某	女	60岁	食堂管理	5000元	全职	早、中、晚餐前	负责工厂食堂买菜、做饭	老板娘表姐
潘某	男	40岁	工厂监督	4000元	全职	8:00-17:30	负责对一线工人和生产线安全进行监管	行政人员潘某表哥
赵某	女	53岁	质量检测	3000元	全职	9:00-17:00	负责对生产布料质量进行检验	熟人介绍
张某	男	45岁	货车司机	6000元	全职	不固定	负责将货物运到佛山、广州等地	熟人介绍

除各工厂为本地人提供了少数就业岗位外，民乐各村中仍零星分散着少数勉强生存下来的家庭作坊，其经营状况断断续续，主要靠承接大中型工厂分流出的订单生存，特点更像是“寄生式”经营：经营者一方面要面临大厂的打压和竞争，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依赖大厂分流出来的零散订单，始终处于“夹缝中求生存”的尴尬境地。

相比第一、第二产业的本地就业人数，第三产业在民乐纺织业转型升级后，则承担起了转移绝大多数本地人就业压力的担子，相较第一、二产业，第三产业发展也更迅速。据统计，自2004年开始，民乐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发展均呈整体下滑的趋势，唯独如第三产业增长率整体高于总产值增长率，产业占有率为从2004年的11.84%上升到了2014年的14.56%^①。

目前从事第三产业的当地人主要分三类：一是过去离开国营丝织厂属城市户口的从业者，很多人都拿失业补贴在当地集市租铺做起了小生意，年纪较大的则通过退休金维持生活。二是部分离开纺织业属农村户口的村民，虽然每年能领到土地股权分红，但靠鱼塘、厂房收租的传统村庄，每年人均股权分红仅5千至6千元，如隔涌村2014年人均分红为5639元，无法满足村民日常消费需求，因此大多数村民都在民乐集市附近或西樵镇上以打散工为主，如商店导购、服务员、

^① 数据来源：中山大学2006年佛山田野实习报告和民乐居委会。

清洁工、超市销售、摩的司机等。年纪较大的女性主要从事工作繁琐、工资较低的工作，如清洁工、服务员；年纪较小的女性主要从事劳动强度、技术含量较低的工作，如办事员、理发师、商品销售、保险、超市导购等；男性以个体户、跑运输为主。三是年纪较轻、学历较高的本地人，他们更乐意从事如会计、出纳、办事员、公务员等白领性质的工作。此外，虽然部分村民还将房屋出租给外来务工人员，但民乐的房屋出租率以及租金普遍不高，普通民宅的月租金在三百元左右，当地工厂也会为外来工人免费提供宿舍，因此在民乐并不存在像城中村一样火爆的房屋租赁市场的存在。

同时，多年来，在民乐集市中也形成了外地人与本地人经营的两种市场体系，人口就业更加普遍化。一方面，从纺织业退出的本地人很多从企业主变成了小生意人，他们经营着农贸、杂货、超市等并形成垄断，如当地人经营的杂货铺是连片经营，杂货铺老板会经常一起出资租车去佛山、顺德进货，通过统一和规模化的进货渠道和进货价格来平衡市场价格和规避市场竞争，形成本地垄断；另一方面，当地经营流动摊贩的基本是外地人，每天民乐集市前的大路旁都摆满了外地人的摊位，以经营水果、服装、蔬菜、烧烤等居多，他们一部分来自从工厂分流出来的外省人，另一部分则是如高要、湛江、罗定等地的本省人，这些外来经营者大多在民乐生活了十年以上的时间，在当地生活得十分稳定。

从民乐居民生计与市场网络的变迁可以看出，一种相对稳定的、本地化的“村中城”经济网络的存在。这是一个本质上非农化的经济网络，商业以满足本地居民需求为主，居民就业的本地化趋势明显。同时，这个网络具有一定的多元性，一定数量的外来人口聚集于此，但又并未构成一个完全陌生性的社区。这一经济网络的存在，证明从经济生活来看民乐已经转变成一个非农业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城”^①。

四、结语

通过民乐的个案分析，我们可以对其地方经济网络的特点进行总结：

一是地方经济不排斥外地人，外地人和本地人在经济上是相互促进、共同融合的。一方面，虽然民乐近年来工业经济出现衰退，但工业仍是地方支柱产业，

^① 杨小柳：《村中城：一种半城市化类型的研究》（暂未发表）。

如 2014 年工业产值占总产值的 80%以上，而民乐工业的生存和发展完全依赖于工厂中人数占绝对优势的外来务工人员。另一方面，外地人在民乐无论是打工、经商还是生活，当地都给予了较大的包容与支持，并未遭受排斥。如民乐集市中穗丰市场的店铺和大量的流动摊贩基本都是由外地人在经营，他们大部分都在当地生活了十年以上的时间，把民乐当成了“第二故乡”。因此，在地方经济中本地人与外地人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

二是在地方经济网络里，与外地人相比本地人已远离纺织业。当地的纺织厂大多都迁往了西樵科技工业园，本地人也不再愿意从事纺织业，本地人的经济角色定位已由过去参与外向型经济，转向了就业、消费以满足本地日常需求为主的内向型经济，他们的就业、消费及生活都倾向在本地社区进行，年人均 5 至 6 千元的土地股权分红根本无法满足人们的日常消费需求，他们并未像城中村居民那样可以依靠丰厚的土地分红和租金收入来安稳度日，因此也呈现出本地就业多元化、普遍化的倾向，尤其是从事第三产业的本地从业者数量急剧增加，也无形中促进了经济网络本地化的形成。

三是地方经济网络的出现，进一步促进了民乐村中城格局的形成。村中城的形成，与早期珠三角城市化特征转变密切相关，南海城市化由自下而上、自发式的城市化转变为自上而下、规划式的城市化，西樵的小城镇中心也由民乐转移到了官山，民乐的城市化便失去了政府主导下的外部动力。与此同时，随着当地纺织业的升级转型，工厂、贸易向西樵新中心靠拢，大量当地人退出纺织业后形成了内聚性的、以满足日常需求为主的地方性经济网络，这使得民乐的城市化失去了自发性发展的内部动力而变得日趋稳定。因此，内部相对稳定的地方经济网络，对“村中城”空间格局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四是形成了相对独立、稳定的村中城格局。在民乐，经常可以看到混乱的城乡混合空间缺乏规划，社区内房屋外形多样，一片片低矮的民居中散布着大大小小的厂房，民居、店铺，各种建筑景观毫无规划的零散地聚集在一起，并非是城中村所展现出“握手楼”“一线天”的景观特征，而是形成了一种集生产、生活、消费于一体的，在经济上相对稳定的，具有独立性的社区格局。

那么，基于民乐地方经济的个案分析，我们研究村中城地方经济网络的意义便在于：改革开放初期的珠三角地区是遍地开花、分散性的、自下而上的都市化，

随后在遍地开花的都市化基础上出现了城市中心，出现了以中心带动周边发展的都市化特征。那么，一大批处在城市边缘地带的或城市圈交接地带的区域是非常普遍的。在早期都市化过程中，这些区域的工商业已经变得十分发达，且改革开放后这种非农化经济发展具有不可逆的特征，它并非像亦农亦工的传统社区一样，当工业退步后还可以重新回去继续进行农业生产，它们已经成为非农化特征十分明显的“城”了。那么这种区域该怎么去发展？又该怎么定位？其变迁的方向是什么？都凸显出这些区域的研究价值。同时，目前学术界大多将目光集中于城中村的研究，在珠三角都市化特征已然发生转变的大背景下，珠三角大多数边缘区域并未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因此，关注“村中城”问题无疑也是对先前研究的补充，是具有研究意义的。

参考文献

1. 蓝宇蕴. 城市化中一座“土”的“桥”——关于城中村的一种阐释[J],开放时代,2006(3)
2. 李培林. 巨变：村落的终结[J],中国社会科学,2002(1)
3. 李胜兰. 外向型城市化发展模式研究——珠江三角洲个案研究[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5)
4. 刘伟文. 城中村的城市化特征及其问题分析——以广州市为例[J],南方人口,2003(3)
5. 田莉. 城中村的真问题[J],开放导报,2005(3)
6. 魏立华,阎小培. 中国经济发达地区城市非正式移民聚居区——城中村的形成与演进——以珠江三角洲诸城市为例[J]. 管理世界,2005(8)
7. 许学强,周春山. 论珠江三角洲大都会区的形成[J],城市问题,1994(3)
8. 薛凤旋,杨春. 外资：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新动力——珠江三角洲个案研究[J],地理学报,1997(3)
9. 阎小培,刘薇. 珠江三角洲乡村城市化的形成机制与调控措施[J],热带地理,1998(1)
10. 阎小培,魏立华,周锐波. 快速城市化地区城乡关系协调研究——以广州市城中村改造为例[J],城市规划,2004(3)
11. 杨小柳,胡敏哲. 华南丝区的变迁——广东南海民乐地区的个案研究[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6)
12. 周大鸣. 泛都市区与珠江三角洲城市化未来发展方向[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
13. 周大鸣. 外来工与“二元社区” [J],中山大学学报,2000(2)
14. 折晓叶. 村庄的再造：一个“超级村庄”的社会变迁[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15. 宋栋. 中国区域经济转型发展的实证研究：以珠江三角洲为例[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16. 蓝宇蕴. 都市里的村庄：一个“新村社共同体”的实地研究[M]. 北京:三联书店,2005

- 17.李培林.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 18.刘宪法.“南海模式”的形成、演变与结局[A],张曙光编,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土地卷）[C].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
- 19.蓝宇蕴.都市里的村庄[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3
- 20.张建明.广州都市村庄形成演变机制分析——以天河区、海珠区为例[D].广州:中山大学,1998